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89 4

丛刊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20042337

4

1989

中图分类法

中華外國文學研究會
中華外國文學研究會

徐州师院图书馆

佩甲一牌甲光永京

1989年11月11日 星期一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张晓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九年 第四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50,000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725册

国内统一刊号：CN 11—2589 定价：2.8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871) 第 4 期 1989 年第 4 期 (总第 41 期)

目 录

· 文学史研究 ·

论“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逻辑关系 吴 康 (1)

二十年代“乡土派”与八十年代

“寻根派”的历史考察 席 扬 (25)
摇曳的上帝的面影

——基督教文化和“五四”文学 马 佳 (37)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构成成份的再认识

——用一个新的价值标准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宋益乔 (58)

试论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及其形象 逢增玉 (80)

东北的生命力与东北的悲剧

——东北流亡文学的底蕴 沈卫威 (94)

· 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研究 ·

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思潮 罗成琰 (117)

文化模式的内在规定与制约

——“五四”与古代：浪漫主义文学比较论 何锡章 龙泉明 (138)

“倡优士子”模式的创造性转化

——兼论前期创造社小说的文体构成 朱 见 (156)

• 作家作品研究 •

多姿的结构 繁复的语象

——张爱玲前期小说艺术片论……………刘川鄂(175)

理智与感情

——论茅盾对艺术的选择……………超 冰(189)

黄昏里那道夺目的闪电

——论穆旦对中国现代新诗的贡献……………李 怡(198)

废名诗歌解读……………蒋成瑀(219)

• 资 料 •

一位现代派诗人的去向

——谈吕亮耕的诗……………蓝棣之(232)

叶鼎洛其人其事及其作品……………梁 永(236)

• 现在文学研究在国外 •

许地山与基督教……………〔美〕路易斯·罗宾逊(240)

傅光明 编译

文协的分会……………〔日〕杉本达夫(256)

李家平 译

• 书 评 •

一部锐意探索的力作

——读魏绍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王卫东(268)

茅盾研究中的一部创新之作

——读《茅盾比较研究论稿》……………秦林芳(273)

《曹禺传》的社会效应……………姚锡佩(278)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

——读华忱之《曹禺剧作艺术探索》……………肖 飞(282)

现实主义：在反思中激活与开拓

——读《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张岩泉(287)

· 论文摘编 ·

怀旧，还是探新？——萧红《呼兰河传》再认识(皇甫晓涛，294) 曹禺悲剧观及其悲剧艺术(胡润森，295) 论“五四”文学创作的情绪特征(赵学勇，296) 新兴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总体审视(吴小美、王喜绒，297) 个性的解放与失落——论“五四”文学中个性解放主题的衰落(任广田，298) 刘大白初论(张孝军，300)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龙泉明，301) 站在历史和东西方观念的断裂带——论中国“多余人”高觉新(汪应果，302) 人性世界的艺术审视与再现——路翎小说艺术新探(王健，303)

· 动 态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学术报告会述略(欣台，304) 第四次老舍学术讨论会在热烈争鸣中举行(关纪新，307) 全国第四届丁玲学术讨论会纪要(308)

· 新 书 林 ·

理性·社会·客体——茅盾艺术美学论稿(茸，310) 作家的足迹(雨村，310)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雨村，311)

编后记.....(313)

(275) 李林森.....《李林森同志追悼会》——

征订启事.....(314)

辛卯年新春寄语 柳希晨 常景明 诗

(285) 李 青.....《李青同志追悼会》——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再认识 义生 文

(282) 李 青.....《李青同志追悼会》——

· 纪念文苑 ·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 念 念 ·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 林 林 ·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曹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悼王 (192, 李林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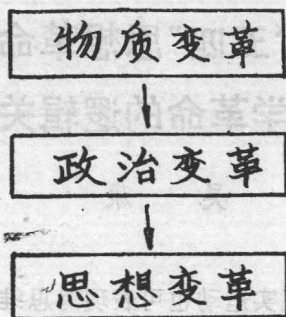
论“五四”思想革命 与文学革命的逻辑关系

吴 康

历史内容方面的现实运动也可表现为思维认识方面的逻辑运动，内容的逻辑可以转化为形式的逻辑，历史的历时性表现同时可以作共时的逻辑表述。作为历史结果的新文化运动在逻辑运动中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变革。

从思维的认识方面来看，近代革命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第三阶段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第一阶段，人们把摆脱侵略的方法放在学习西方的先进物质文明方面，即所谓“师夷长技”。在军事上有洋务派的“船坚炮利”；在经济上有早期改良主义的“商战固本”。他们都认为借助洋人的先进兵器与发达的经济是“富国强兵”反帝御侮的唯一方法。但历史否定了这种貌似有理的认识。因为处在某一社会的变革时期，生产关系、国家政权的变革往往成为经济变革的关键。于是到第二阶段，革命者把眼光投向国家政治，他们认识到先有政治的变革，才会有经济的变革，后者必须靠前者开辟道路。这种认识就导致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但是，任何深刻持久的政治大革命首先必须是声势浩大的广阔而自觉的国民革命运动，政治革命必须以思想革命为基础。所以到第三阶段，革命的焦点集中到了资产阶级精神文明的传播上，它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全面变革，表现为一场普遍的国民思想革命和思

想解放运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近代中国普遍的理论思维的发展模式：



该模式表明：新文化运动既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也是人们思维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它由上而下地运动：它的落脚点靠近了下层社会，它的对象在于改造民众，它的目的在于全面地变革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将使我们看到，这种变革已极恰当地靠近了文学，或者说给文学提供了条件。

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是陈独秀，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全面展开了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革命。

启蒙思想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现实特征，意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历史并不要求他们一般地抽象地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和国家理论（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这样作了），而是要他们把这些学说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中去，关键在于改造现实的个人——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统治的民众。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从政治革命而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陈独秀对这

一点认识尤其深刻：“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①。因此，启蒙思想家甚至把思想革命看得比政治革命还重要：“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所以皇帝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②。思想革命是改造国民灵魂的现实运动，是社会意识观念的全面变革，因此，它实质上是围绕人而展开的普遍的社会伦理道德的革命。陈独秀极深刻地把这种伦理的革命、伦理的觉悟称之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③。

因而伦理道德革命构成了思想革命的主体内容，它可归结为十个大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新道德指建立在民权主义政治学说上的“个人本位主义”；旧道德即指浸透孔教纲常伦理的家族本位主义”。

在个人本位主义的旗帜下，《新青年》思想家以巨大的热情和气魄塑造了一个大写的“我”字：

于宇宙万象中，忽标识一两足纵生之物，谓之曰人；于人类皙黄棕红黑五色中，各持一标识自己之共名，谓之曰我……自我以外皆非我也，我之性质，即独立之性质，即对于他人他族宣战之性质^④。

这个“我”顶天立地，包含世界，“有目之我，然后五色立；有耳之我，然后五声显；有口之我，然后五味生；有鼻之我，然后五香呈。世界一切有形之大地，山川飞走潜游，皆因我而亭毒；无形之忧悲苦恼欢喜愉快，皆因我而弛张”^⑤。“我”的人生目的即为“寻

①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②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③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

④⑤ 易白沙：《我》，《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求快乐，趋避痛苦”^①。“人生第一天职即在避苦趋乐之方”^②。因此，只有在个人自利享乐主义的基础上，才能言利他，才能言利国家。“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③。这样启蒙思想家从现实人生出发，把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政治学说转变成了现代中国的“个人本位主义”，转变成了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新型社会道德观^④。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提倡新道德必须反对旧道德，提倡个人本位主义必须反对孔教的家族本位主义。反孔孟、覆伦常是启蒙思想家的另一核心论题。陈独秀写了这方面的一系列尖锐犀利最有战斗力的论文，他猛烈攻击构成封建伦理道德核心的“三纲五常”。所谓“君为臣纲”是使人民成为封建帝王的奴才；所谓“父为子纲”是使儿子成为父亲的附属品；所谓“夫为妻纲”是使妻子成为丈夫的奴婢。在三纲的束缚下，作为“人民”、“儿子”、“妻子”的个人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权利和独立人格。由“三纲”之说所派生的“忠”“孝”“节”“义”等更是一种戕害人性的奴隶道德规范。它们与现代意识、现代生活完全不相适应，完全悖于个人自由平等的新道德，但与封建专制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因而必须彻底扫荡之！^⑤

“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孔教对封建伦理与封建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的典型概括。所谓“修身养性”即是“克己”，是把封建的国家机器建立在对人的压抑上，建立在残酷的禁欲主义上。

① 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同上，第二号。

② 高一涵：《乐利主义与人生》，《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③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一卷第2号。

④ 这种新型道德观最集中、最强烈地表现在后来的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可以说，《女神》是一部气势磅礴的颂扬自我的立体交响曲。有关《女神》的这种评论请见拙作《〈女神〉——一部表现主义的诗集》，载《郭沫若研究》第五期。

⑤ 陈独秀这方面现的著名论文有：《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等。

个人的欲望、自然需求、幸福和聪明才智都受到禁锢与压抑而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道德的自我抑制中，人在欲望上退化为动物，在精神上堕落成奴才。并且，“治国平天下”的国家观念内在化为“修身养性”的道德自我抑制过程是通过“齐家”的环节实现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①。“齐家”与“治国”并举，封建家族制度充当了封建专制统治对个人道德抑制的中介环节，家族制度乃封建专制的细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②。齐家以孝为本，治国以忠为本，忠孝异词而同义：“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因此，“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③。如果说家族制度乃封建专制的具体化、世俗化，那么基于个性解放，从伦理上反对封建专制其实质就在于具体地扫荡古老的封建家族制度^④。

在这里，我们看到现代启蒙思想家已经触及到了一个现代中国变革的极其深刻的现实问题。经过封建统治者与道学家们几千年的教化，封建观念实际上已经转化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舆论，甚至积淀成了每个社会成员的无意识心理结构，内在化为广大国民的灵魂与性格。因此，当启蒙思想家一旦深入地发动社会伦理的道德变革时，他们就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的这个最根本的思想现实，他们就把国民灵魂改造这个思想革命最关键的课题紧紧地联系起来了。因而他们提出了“改造国民性”这个最伟大的时代任务。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提出是思想革命同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陈独秀把“抵抗力之薄弱”视为中华民族最深最大的病根，认

① 《大学》。

②③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④ 反对封建家族制度是鲁迅思想活动和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狂人日记》是其杰出的代表作。自此之后，描写个人与家庭对立成为新文学的核心课题之一。

为“退缩苟安铸成民性”^①。有的思想家则将我国的病态国民性概括为“惰性”。“惰性者，吾国人之公毒也，即吾国人之公敌也”。中国国民的一切言行举止皆由惰性主宰，所谓“将就”、“敷衍”、“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等，乃是国民惰性的种种表现^②。有的从“一国之种族地势气候学说政教”全面剖析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③。有的则从封建专制方面推求形成病态国民性格的原因，认为专制下的民众只存在“命令”和“服从”两种心理；专制国家也就只有两种人：“命令者与服从者”，“专擅与奴隶”，因而必须根除国民的奴才根性^④。更可贵的是，启蒙思想家号召有识之士，把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带到乡村中去，“治理这些乡村的人”。“我们现在第一要务，调查‘郡国病例’，就是从乡村生活，农民生活方面着手”^⑤。

基于时代的高度，《新青年》思想家们从一开始就深刻地把握了历史的制控点，把社会道德伦理的变革当作思想革命的主体内容，从而系统地提出了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新道德代替以封建家族制度为根本的旧道德的主张。道德变革一经与现实的人的变革相吻合，就导致了他们对改造国民性这一时代核心问题的深入探讨。这就是《新青年》启蒙思想家的主要理论建树与历史贡献。我们可以用如下模式来表现：



①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② 高语罕：《青年之敌》，同上，第一卷第六号。

③ 光升：《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④ 陶履恭：《我们政治的生命》，同上第五卷第六号。

⑤ 陶履恭：《社会调查》，同上，第四卷第三号。

但是，以上模式在逻辑层次上是不完善的。伦理革命并不是思想革命的唯一表达方式，作为理论思维的伦理变革不可能从现实性上完全担负起变革民众改造社会的重任。这里，必须有另一种形式介入其中，它在现实性上最贴近人和社会，在理论级次上表现为现实与意识观念的最初环节，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具象。不言而喻，这种形式便是文学。文学的实质是形象和感情，因此它（也唯一只有它）能充当思想革命与人及社会现实之间的中介环节，满足以上条件。

历史正显示了这种文学的必然性。早在一九〇四年，陈独秀就创办白话报，欲以戏曲改良人生。一九〇六年，鲁迅弃医从文，认识到文艺是改造国民精神的利器。其弟周作人在其影响下亦放弃学工，从事文学活动。一九一六年，李大钊预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赖新文艺为之先声”^①。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学农（后学哲学）的胡适也在聚众商讨文学形式变革……正是在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感召下，文学革命极欲挤上历史舞台。倡导道德变革的《新青年》开始并没有考虑到文学的变革，一年以后，这一重大的缺陷便明显表现出来了：一九一六年十月，胡适写信严厉指责《新青年》的刊登古诗，并批评该刊把一首文句不通无聊的古诗称为“希世之音”^②。这种同新文化运动极不协调的矛盾现象引起了陈独秀的关注，因而立意改革文学。一九一六年胡适发泐译作《决斗》，陈独秀誉为“改良文学之先导”。当胡适来信告知欲提出文学改良八事时，陈独秀大为欣喜，誉为“今日中国之雷音”，并恳请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③。于是，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正式宣告开始。

①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选集》1959年版，第61页。

② 请见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1页。

③ 陈独秀：《答胡适之》（1916年10月1日），《胡适往来书信选》（上）。

后来，毛泽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概括为两面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道德革命与文学革命并举，正深刻体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同时，这之中也应深刻包含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二

然而，现象并不与其本质直接同一。历史总是曲折地显示其自身的逻辑，因而对辩证的理论反思来说，历史的内在逻辑要求阐释。如上所述，文学革命既然是应思想革命的迫切要求产生的，那么它在形式上理应与思想革命紧密衔接；但是恰恰相反，它没有这样作，而是把革命放到了另一方面：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所发动的只是一场自觉的文学形式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场语言形式革命——白话文运动。形式革命本身没有触及到以上所论述的思想革命的深刻内涵，也就更谈不上涉及思想革命核心的道德变革和人的改造了。凭这种纯粹的形式革命怎么能发动必然的文学革命呢？然而历史却正是这样展示的。

揭开文学革命序幕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项改革主张，前三项关于内容革命的主张显得空泛肤浅。“言之有物”一项涉及新旧文学的根本区别，可短视的胡适不可能把“物”的内涵阐述清楚，因而无法同封建的“文以载道”划清界线。“不摹仿古人”不过是源于明代“三袁”和清代袁枚赵翼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它只是描述了文学形式的历史更替，并没有揭示出更替的内在原因，因此也难以说明新文学的产生。“不作无病之呻吟”始面对现实考察文学，可算触及了文学革命的主要问题，但却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一笔带过，就束之高阁了。因此我们认为胡适有关文学内容革命的思想充其量只是些片断的随想，零散无力而远够不上系统的创建。

相反，他的后五项关于文学形式革命的观点则明确有力得多。

“须讲求文法”，“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诸项，从文法、词汇、修辞、写作技巧等方面，对旧文学的文言形式作了全面的否定。在这几条下，古文写作的为封建文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诗词格律、骈四俪六、行文章法和微言精义等法则被推倒了。整个古代文学，在胡适眼里甚至只剩下一部白话文学史。“不避俗字俗语”一项则更进一步，从根本上判了封建文学的死刑，是胡适文学革命的精髓。“以白话代文言”，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的观点无异文学革命的“雷音”。文学形式革命的前几项还只是从文言文学的结构、文体等方面指出它的弊病，使封建文人尚存修补的可能，而以白话代文言这一条，便把文言文学“一锅端”了。因为文言乃是封建正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外壳。

一九一八年，胡适发表带有总结性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不再注重《刍议》中的前七项主张，唯独把“不避俗字俗语”一项加以扩大发挥，并把他的全部主张归结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文章详尽地阐述了文学创造国语的根本观点：“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①。这样，胡适把文学变革与国民语言（白话）变革相并列，从而把他的形式革命主张推到了一个顶点。胡适把文学形式革命当作广泛的国语运动的关键这并非历来的文学史家们所认为的，是把文学革命降低到了一种纯粹的语言形式变革而完全无视文学内容的变革，是十足的改良主义，是倒退；恰恰相反，这标志着胡适形式革命主张的极大深化，是他的理论主张发展到最高点的表现，是他倡导文学革命的全部功绩所在。把文学革命首先看作国民语言革命，这不仅表明胡适十分准确地认识到了语言形式与

①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新文学的血肉联系，使新文学在形式上同封建旧文学判然有别；而且使文学革命极大地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一方面使文学革命紧紧地联系着以道德革命为核心的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整体变革，亦即联系着思想革命；另一方面，使文学革命以国民语言——白话——为连结点紧紧地连结着广大的民众。

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发生于现代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学革命具有它自己的特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对民众的要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思想革命对文学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根本的隔阂——语言文字的隔阂。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的书面语言——文言，是他们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主要工具；而广大民众却基本上与此隔绝，他们只有自己的口头言语——白话。因此，中国资产阶级鉴于近代革命的教训，要唤醒民众，要摧毁封建思想体系，完成它的政治革命，就必须放弃他们从封建教育那里承继来的思维工具——文言，站到民众的立场上，提倡另一种来自民众的言语——白话。资产阶级要与此相应地摧毁封建旧文学，建立新文学，就必须首先破除封建文学的物质外壳——文言，为民众的白话文学争得文学的正宗地位。就这样，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发展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身上，资产阶级则求助于民众的觉醒，寄希望于思想革命；思想革命重在文学革命的展开，文学革命则首先在于文学工具——语言形式——的变更。历史透过它的层层必然性，然后把最现实最直接的那个可能性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之上：语言形式的革命。于是，以白话代文言，就适应着历史的必然要求，充当了资产阶级与民众之间的连接物，包含巨大历史内容的文学革命首先表现为一场语言形式的革命。

在这种辩证的阐释中，胡适形式革命的主张显然从形式方面体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该逻辑的一个重要方面